

海洋人类学: 概念、范畴与意义

张先清, 王利兵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人类学对于海洋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的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才正式诞生。所谓海洋人类学,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内陆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深入了解和认识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人类与海洋之间关系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海洋人类学; 渔业社区; 海洋社会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4)01-0026-09

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 and 开发亘古久远。作为与大陆文明相对应的一种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与海洋紧密互动而形成的。因为海洋环境存在差异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适应也不尽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样性的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尊重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对于海洋族群与海洋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最终发展出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这一独立分支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兼跨人类学与海洋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在推动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拟从追述人类学的海洋研究入手,介绍海洋人类学的概念发展,界定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并对这一重要分支学科的学科意义略加阐释,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类学学科提供借鉴。

一、海洋人类学的由来及概念界定

所谓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类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它主要探讨包括渔业社区的人口、家庭、风俗、宗教信仰、生计方式、组织规范、技术工具、艺术以及海洋适应、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与海洋生态保护、渔业

收稿日期: 2013-10-0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南中国海周边区域的族群关系与社会文化研究”(ZK1032)

作者简介: 张先清,男,福建永安市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王利兵,男,安徽安庆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

• 26 •

资源管理、全球化对于地域渔业社区发展、海洋资源共享、海洋利用协作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与人类学发展息息相关。西方人类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海洋和渔业社会,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初,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 C. Haddon)教授就曾组织开展了著名的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调查,对海岸带土著人的体质、心理、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和工艺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此外,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及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撰写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萨摩亚人的成年》,也是专门针对海岛土著部族的人类学研究。^[1]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类学经典以海岛土著作为研究对象,与西方早期海外殖民统治格局是密切相关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点是“土著”而非“海洋”。人类学真正意义上以渔村、渔业为主题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研究,是由被誉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所完成的。1939—1940年间,弗斯与其妻子在莱弗尔梅(Leverhulme)奖学金的资助之下,前往马来半岛东海岸调查和研究当地的海洋渔业,并写成了《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2]一书。该书于1946年出版,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当地渔业经济的细节描述,如渔获量、商品价格和um场组织、渔民收入、资本投入及借贷等;除此之外,作者也对影响当地渔业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宗教信仰等进行了深度分析。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以往人类学主要针对农耕社会和采集狩猎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海洋及渔业社会文化。可以说,弗斯的《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视角专门针对一个渔业社会及其经济关系所完成的海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类学关于海洋渔业社区的研究日渐增多。伴随着大量相关论著得以出版,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日趋明晰。从现有资料可见,20世纪50年代早期,西方学术界已开始正式提出“海洋人类学”这一名称,^[3]其最初定义主要是用来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带人群的民俗文化和物质文化。而随着人类学日渐介入海洋社会研究,其研究内容也渐趋丰富,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从最初集中关注海洋民俗文化,发展为有关海洋社会文化类型的整体性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海洋人类学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为学术界所熟悉和认可,其研究也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而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共有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应运而生,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国人类学家史密斯(M. Estellie Smith)所编著的《海上人家:一项海洋人类学研究》(Those Who live From the Sea: A Study in Maritime Anthropology)一书。^[4]

在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渔业社区与海洋社会是两个争议较多的核心概念。从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其所考察的对象基本集中在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渔业社区和群体。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渔业社区和群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特殊性,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技术工具以及思想观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关什么样的社区才属于渔业社区,渔业社区应该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渔业社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渔业而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却一直都有争论。^[5]概而言之,这些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主要是从社区的文化或文化建构(culturally constructed)的角度来考虑,如Marian Binkley、Gerald Sider和Anthony Davis等人主要是从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亲属关系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来定义渔业社区;^[6]而Steve Jacob和Michael Jepson等人则认为,既然是渔业社区,那么渔业在人们心目中和认识观上必须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7]Richard Apostle等人在对加拿大和挪威的渔业考察之后则发现,渔业是一个“文化的容器”(cultural containers),它容纳了很多特别的技术、组织形式、制度、知识和身份认同等内容。^[8]另一派则是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定义渔业社区,如Bonnie H. McCay认为可以依据地理学上所说的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来定义渔业社区;^[9]Patricia M. Clay和John J. Poggie Jr.等人则强调渔业社区应该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时又同一片海域作业的存在各

种联系的人群共同体,^[10]这一定义特别强调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地域上的联系。虽然以上定义强调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渔民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突出的流动性,渔民在陆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渔业聚落,但是在海上作业时,却通常是随波逐流,分散行动的;另外,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船主与船员之间关系也发生了较大改变,^[11]船主已不再经常雇佣自己的亲属当船员,所以说从文化建构以及地理位置等单一方面来判断和定义渔业社区显然是存在不足的。

与西方学术界不同,目前国内从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多强调使用“海洋社会”作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对于何为“海洋社会”,不同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较多分歧,大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12]第二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13]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14]正是因为意识到一门学科在诞生之初总是会遇到概念界定等问题,著名海洋史学者杨国桢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概念磨合,他认为概念磨合是任何学科创立之初都会存在的问题,概念磨合是一个交叉、渗透和融合的研究过程,它不仅不会贬低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还会刺激更高层次的多样性研究。^[15]

其实,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任何概念都并非固定不变。自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洋社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急剧变迁的过程。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急剧减少,如今沿海地区采用传统的出海捕鱼方式来经营生计的渔民越来越少,相当多数的渔民转而从从事海产养殖;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产业也因为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便利交通优势,纷纷将企业和工厂转移到沿海渔村,由此吸纳了大量渔村劳动力,导致从事传统捕捞业者越来越少,渔村人员外流严重,出现巨大变化;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移民流动等因素也使得传统渔业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所从事的职业发生了变化,渔村呈现较大变迁,生长于海洋社会的人群,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都渗透着海洋的因子和色彩。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海洋社会的这些变迁也恰好正是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一。由此观之,我们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研究不必过度拘泥于概念的严格区分,只要我们立足于从多维视角来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内涵,不同学科和学者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相关概念的理解就必然会愈加透彻和清晰。

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目前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由于切入学科性质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例如海洋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学主要关注各种与海洋有关的习俗、神话、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等,海洋考古学则侧重对于史前海洋文化、海洋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以及历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发掘之类问题的探究。近期兴起的海洋社会学则注重考查社会条件变量与海洋开发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从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社区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

的海洋人类学家 James R. McGoodwin、John J. Poggie Jr.、Richard B. Pollnac 和 Rob van Ginkel 等人的一系列论著,几乎都是从海洋民族志视角考察渔业社区问题。以研究海洋渔业著称的人类学家艾奇逊(James M. Acheson) 曾经将海洋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现代渔业(modern fisheries)、船上生活(shipboard life) 和史前海洋适应(prehistoric marine adaptations),^[16]但这一归纳显然还是比较狭窄的,并未能涵盖海洋人类学的丰富研究内涵。从海洋人类学兼具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独特学科特点出发,同时结合对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分析,我们认为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渔业社区的整体性研究。渔业社区是海洋和渔业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为整体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经济,而且还可以窥探具有多样性文化特征的渔民生活。具体来说,渔业社区研究应该包括社区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文化规范、生产方式、技术工具、经济模式、行为方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心理性格、宗教信仰、音乐艺术以及船员的水上生活和渔业社区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二是有关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内容的应用性研究。^[17]众所周知,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的强度日渐加大,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海洋生态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带的过度开发、污染加重以及政府政策与渔业社区文化之间矛盾频生,这些都是海洋人类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海洋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一点,从西方海洋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已开始从海洋文化转移到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公共财产资源管理、海洋使用权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强应用对策性的问题探究上。三是海洋社会文化其他问题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岛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适应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当然,海洋人类学在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的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学。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会疑虑上述海洋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学科重叠问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海洋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重叠。在海洋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之间经常会出现研究对象重叠、研究区域相近等问题。对此,我们认为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研究重叠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对于人类学这样一门“学科之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18]其实,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差异只是关注点和研究内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视角皆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的深度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互有交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海洋社会的研究,既可以是针对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生计模式,也可以是关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和渔业资源的管理,同时还可以是海上或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宗教信仰等等。但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与人类学对于农耕及采集狩猎等社会的研究不同,海洋人类学注重“以海洋为本位”^[19]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和文化规范等。其二,海洋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重叠。如同样对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开展研究的海洋社会学,以及对海洋社会和人群的民俗、信仰开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学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人类学与上述海洋社会学、海洋民俗学在一些研究范畴上确实存在交叉重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在视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海洋人类学注重从海洋主体性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文化。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原始、先进与落后,以及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和思维。以人类学对于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为例,学者们基本都是站在一种“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将这些非中原汉人社会的族群和文化视为边缘,从而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独立性和他们对于文化进行再建构的能力。^[20]又如在关于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研究中,以往很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民族学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汉文史籍为依托、王朝史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框架中,从中原看四方、陆地看海洋、华夏看岛夷”,从而使历代海洋族群的社会历史和

价值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21]因此,如欲将海洋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于海洋的研究区别开来^①,就必须转换视角,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即以“海洋的思维”作为开展研究的主导思想,突出海洋社会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和学科优势所在。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来,长时间(通常为一年)地参与到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生活中,与被调查对象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通过田野笔记等各种方式来记录和获取资料就一直被奉为人类学家开展调查研究的圭臬。^[22]人类学的这种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两个优势:一是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可以让研究者观察到被调查社区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图景;二是参与式的观察可以让研究者同时拥有一种主位和客位的双重研究视角,进而获得更多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体到海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发表之前,很多学者批评人类学家对于传统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研究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因而不具有科学性。然而,弗斯的著作《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一经发表,就对很多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质疑及批评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还使用了很多统计性的数据,包括渔民的渔获量、出海时间以及渔市中的资本、利息、利润、工资等,从而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他在实际调查中对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有效运用,此外,弗斯在全书的附录部分还增添了许多其在调查过程中所搜集到的有关船只、技术、资本、鱼产量等的统计数据 and 图表。^[23]像弗斯这样精细的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类学的深度参与观察才能完成。所以说,在海洋社会研究方面,无论是从研究视角亦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类学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优势。

海洋文明是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类文明形态之一,它是人类与海洋长久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弗斯在《人文类型》一书中,曾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重要影响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如何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各种问题的。^[24]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海洋文明定义为一种海洋人文类型。那些生活于岛屿、海岸带、沿海村落等海洋社会的人群,“走洋如适市”,^[25]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主要的生存空间。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大海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环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经常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必须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如天气、风向、潮汐、设备、技术等,才能够在海上作业,否则任何气候状况变化或操作失误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海洋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上都产生了与其他两个文明类型有所不同的内容。对于海洋族群来说,海洋作为一个“自然家园”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的诞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是其研究却吸引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人类学

^① 台湾人类学家王崧兴于1967年出版的《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是较早的一本优秀的中国海岛民族志。在这本书中,王崧兴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很好地阐述了在龟山岛这样一个以渔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地方社会,其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特殊性。但对于海洋族群思想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则较少深度描述和探讨。参见王崧兴《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

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海洋人类学的诞生缘于对现实的关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 60 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带、海域、岛屿组合而成的海洋社会系统是人类社会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带。在中国,海洋同样已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甚至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和海洋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可以看出。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包括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海底能源的勘探与开采以及海洋和岛屿旅游业的开发等,海洋已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海洋及海洋社会的深度认识,一段时期内,人们陷入了一种盲目和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的境地,进而使海洋生态变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为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领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界定和共识,所以在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相邻各国之间经常会出现诸如争夺海域捕捞权、渔民越境跨国捕鱼、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管理混乱等问题。正是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1982 年,世界各国在牙买加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 1994 年 11 月 16 日正式生效。^①但是,从现实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对于海洋发展和海洋保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效应。相反,由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明确划分,使得一些沿海国家对于海洋的开发呈现出纷杂多样的局面。其实,海洋问题的出现,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有关海洋利益的争夺,从更深层次来看,它透视出的是人类如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问题。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开展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西方学者开展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涵盖渔民之间的协作、渔业资源的管理、海岸带的管护、海洋生态的保护、沿海滩涂的开发、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海洋政策的制定、渔业社区的变迁和港口文化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为人们重新认识海洋和处理人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国家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渔业保护管理局(MSA)在定义“渔业社区”的概念以及制定渔业政策的时候就充分参考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和意见,^[26]美国的国家海洋局顾问委员会中也总是固定会有几名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又如在挪威,国家在发展海洋旅游业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钻井平台之前,通常都会先雇请一个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对相关海域的海洋生态、渔业资源、社区文化和开发之后可能会造成的相关影响进行调研和评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国、冰岛、荷兰、日本等海洋国家,政府部门对于海洋人类学家的研究同样也十分重视,并适时将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吸纳到了本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人们一直抱有一种以陆地为本位的视角,将海洋看做是陆地的附属、边缘和终结,海洋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仅在于海洋是沟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濒海的各民族成为邻居。^[27]然而,海洋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远非如此。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试图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这种传统认识观,从而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海洋和处理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认识海洋社会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关键点就是要树立海洋主体性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社会是与陆地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正是由于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那些长期以来靠海为生的海洋族群在认识和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时也就会表现

^① 该公约的诞生改变了过去领海之外即公海的传统格局,全世界 30% 多的海洋(约 1.094 亿平方公里)被划为沿岸国家的管辖海域,“内海水”(领海基线之内的海域)和“领海”(从量算领海宽度的基线算起不超过 12 海里的海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享有和陆地国土相同的完全主权,同时公约还规定一国可对距其海岸线 200 海里(约 370 公里)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

出与其他社会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海洋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正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也是有效处理当前海洋危机和人海矛盾的关键。摆脱来自陆地视野下的传统海洋认识和海洋研究,回归到以海洋为本位的学术视野下来认识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类学研究可以作出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海洋人类学在定性定量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主观描述常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数据统计和分析则显得不足,而这种所谓缺乏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写作方式,正是造成 20 世纪 80 年代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对于人类学写作模式展开批评的原因之一。^[28]而在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著作中,定性定量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量有关渔业经济、船只、设备、资本、收入、价格等数据的定量统计和分析被广泛使用,甚至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鲜见。更为重要的是,海洋人类学家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不仅可以从渔业社区获得上述真实有效的定量统计数据,而且也可对海洋族群的日常行为、仪式过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细致“深描”,从而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志资料。因此,从学术层面来说,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毋庸置疑,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对于海洋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海洋开发和利用也愈加立体、多样和全面,然而,就在人类大力开发海洋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人海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此外,海洋争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洋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缘于对海洋与人类发展的现实关怀,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得以正式诞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应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层面,海洋人类学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对于海洋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其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自身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而获得这些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的了解和认识,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说,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的一个重要交叉研究领域,它在推动和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影响深远。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类学学科,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海洋传统的海洋大国,尽管在一段时期内,这种海洋传统与国家的海洋性曾一度被遮蔽与弱化,但历代“以海为田,以渔为粮”的海洋族群,一直实践着这种海洋传统,并在多样化的海洋生计、习俗与仪式中不断建构其自身的海洋族性边界,由此形塑出多元的海洋观,进而在环中国海域的广袤国土上培植出了一种珍视海洋、善待海洋的海洋精英主义,这是中国对于世界海洋文明的重要贡献,也是值得重视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知识。因此,认真吸收西方海洋人类学既有研究成果,结合中国本土实践,构建我国的海洋人类学学科,不仅有助于重新阐发中国的海洋传统,而且对于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存,乃至当前我国制定正确的海洋战略方面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然,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中国的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还需要开展很多工作,包括海洋民族志资料的积累、相关核心概念的进一步凝练、学科理论与体系的建立等,而这些无疑都有赖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完善。

注释:

- [1] Haddon A. C. ,ed. *Reports on 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six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1—1935;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张云江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 年;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玛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李姚军、刘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 [2] Raymond Firth. *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Ltd. ,1946.
- [3] Rob van Ginkel. “Maritime Anthropology: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 , In Bostjan Kravanja and Matej Vranjes (eds.) . *MESS: Mediterranean Ethnological Summer School*. Vol. 6. Ljubljana: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2005 ,pp. 45—78.
- [4] M. Estellie Smith. *Those Who live From the Sea: A Study in Maritime Anthropology*. San Francisco: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 [5] [26] Patricia M. Clay and Julia Olson. “Defining Fishing Communities: Issu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Napa Bulletin* 2007(28) , pp. 27—42.
- [6] Marian Binkley. “ ‘Getting by’ in Tough Times: Coping with the Fisheries Crisis” ,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00 23(3) , pp. 323—332; Anthony Davis et al. . “Fishing Families and the Changing Fabric of Small Boat Fishing” , *Social Research for Sustainability Fact Sheet* 2002(11) , pp. 1—11; Gerald Sider. *Culture and Class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A Newfoundland Illust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7] Steve Jacob ,Michael Jepson and Frank L. Farmer. “What You See is Not Always What You Get: Aspect Dominance as a Confounding Factor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Fishing Communities” , *Human Organization* 2005 64(4) , pp. 374—385.
- [8] Richard Apostle et al. . *Community ,State and Market on the North Atlantic Rim: Challenges to Modernity in the Fisher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 [9] Bonnie H. McCay. “Sea Changes in Fisheries Policy: Contributions from Anthropology” , E. Paul Durrenberger and Thomas D. King eds. *State and Community in Fisheries Management*. Westport ,CT: Bergin and Garvey 2000 ,pp. 254—272.
- [10] Patricia M. Clay. “Management Regions ,Statistical Areas and Fishing Grounds: Criteria for Dividing up the Sea” , *Journal of Northwest Atlantic Fisheries Science* ,1996(19) , pp. 103—126; John J. Poggie Jr. and Carl Gersuny. *Fishermen of Galilee: The Human Ecology of a New England Coastal Community*. Narragansett: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 1974; Kevin St. Martin. “Making Space for Community Resource Management in Fisheries”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1 91(1) , pp. 122—142.
- [11] 康拉德·科塔克著《远逝的天堂: 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第四版) ,张经纬、向瑛瑛、马丹丹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133 页。
- [12] [15] 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1 期,第 95—100 页。
- [13] 庞玉珍《海洋社会学: 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6 期,第 133—136 页。
- [14] 张开城《应重视海洋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探索与争鸣》2007 年第 1 期,第 37—39 页。
- [16] James M. Acheson. “Anthropology of Fishing”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0(1981) , pp. 275—316.
- [17] Rob van Ginkel. “Maritime Anthropology: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 , In Bostjan Kravanja and Matej Vranjes (eds.) . *MESS: Mediterranean Ethnological Summer School* Vol. 6. Ljubljana: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2005 ,pp. 45—78.
- [18] Eric Wolf *Anthropology* Newyork: Norton ,1964 ,X.
- [19] Donald K. Emmerson. “The Case for a Maritime Perspective on Southeast Asia”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80 ,11(1) , pp. 139—145; 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安嘉芳主编《海洋文化学刊》第 7 期 基隆: 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 2009 年,第 1—8 页。

- [20] 麻国庆 《作为方法的华南: 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思想战线》2006 年第 4 期,第 1-9 页。
- [21] 吴春明、佟珊 《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历史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3 期,第 9-17 页。
- [22] H. Russell Bernard.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Fifth Edition). Lanham, New York, Toronto, Plymouth, UK: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1. pp. 256-290.
- [23] Raymond Firth. *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66.
- [24] 雷蒙德·弗斯著 《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 年。
- [25] 张燮著 《东西洋考》,谢方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5 页。
- [27] Donald K. Emmerson. "The Case for a Maritime Perspective o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0, 11(1), pp. 139-145; 杨国桢 《人海和谐: 新海洋观与 21 世纪的社会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3 期,第 36-43 页。
- [28] 参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 《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年。

[责任编辑: 陈双燕]

Maritime Anthropology: Concept, Category and Significance

ZHANG Xian-qing, WANG Li-bin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Anthropologist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marine and researched it for a long time, but up to the 1970s, maritime anthropology was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sub-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Maritime anthropology use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perspective and method on the marine social crowd behavior and culture, and tries to analyze and research them. Maritime anthropology emphasizes a "sea-based" perspective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marine soci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highlights that the marine community, a unique social-cultural type, is different from inland society as it has its own operational logic and cultural norm. To understand and know marine and its uniqueness of social-cultural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the premise of benign development and use the ocean for human beings,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ocean.

Key Words: maritime anthropology, fishing communities, marine society